

疑問がわき起こってくる。かれらは一体何者なのか。そして、かれらはいかなる資格でそこに居合わせる。そもそも中国に「中国共産党」なる名称が現れたのは、実は辛亥革命直後の一九二二年にさかのぼる。三月に上海の『民権報』に掲載された「中国共産党」の黨員募集広告、および同年四月二八日の『盛』に載った「中国共産党」の政治綱領がそれである。ただし、この「共産党」は紙の上の政党であった。

# 中国共産党成立史

〔日〕石川楨浩◎著

袁广泉◎译

#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

[日] 石川禎浩◎著  
袁广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5-58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  
ISBN 7-5004-5240-3

I. 中… II. ①石…②袁… III. 中国共产党—党  
史—研究 IV. 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4294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a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桃园装订厂

版 次 2006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4

字 数 380千字

定 价 35.00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 例

一、除特别注明外，引文中的（ ）为原注，[ ]为引用者注。

二、注释说明所用罗马字代号《A》—《G》，分别表示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如下档案目录。

《A》：《过激派其他危险主义者取缔关系杂件 本邦人之部 主义者名簿》分类项目 4—3—2—1—1—1

《B》：《过激派其他危险主义者取缔关系杂件 外国人之部 支那国人》分类项目 4—3—2—1—2—1

《C》：《过激派其他危险主义者取缔关系杂件 社会运动状况 支那》分类项目 4—3—2—1—4—5

《D》：《要视察外国人之举动关系杂纂 支那国人之部》分类项目 4—3—1—2—5

《E》：《外国人退去处分关系杂件 英国人》分类项目 4—2—6—21—3

《F》：《外国人退去处分关系杂件 支那国人》分类项目 4—2—6—21—8

《G》：《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杂之部》分类项目 3—10—5—3—6

三、收录于各国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资料集（俄文版：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 I.（1920—1925），Москва，1994；Т. II.（1926—1927），Москва，1996；Т.

III. (1927—1931), Москва, 1999; 德文版: *RKP (B), Komintern und die national-revolutionare Bewegung in China: Dokumente. Band1. (1920—1925), Munchen, 1996; Band2. (1926—1927), Munster, 1998*; 汉语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的文件)的文件,因其文件号码相同,注释说明中只标出文件号码,如〈文件○〉。

# 序 章

## 第一节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上海接触

1921年4月，日本著名的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了上海。他当时到过的地方，经过其后80年的沧桑，很多已经旧踪难觅，现在却只有一处复原成当时的样子加以保存。这处建筑，现在的门牌号是卢湾区兴业路76号，旧时是法租界望志路（Rue Wantz）106号。<sup>[1]</sup>不过，对这处建筑加以复原并非是为了纪念芥川造访上海的足迹，现在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门前的铭牌上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字样。也就是说，在芥川来到该处不久后，就在他所看到的那个地方，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sup>[2]</sup>

当然，芥川并非因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将要在这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来，而是为了会晤“‘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的“李人杰”。李人杰，原名李书诗，通常称李汉俊，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成立时的成员之一（脱离中共后，1927年遭军阀逮捕杀害）。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芥川来访三个月后，即1921年7月末，就在李汉俊的寓所召开了。芥川在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方，会晤了中共领导人，实在是一种巧合。

据推测，芥川和李汉俊是4月25日前后晤面的，芥川《上海游记》里有《李人杰氏》一节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与村田 [《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村田孜郎] 同访李人杰氏。李氏年仅二十八岁，按信条应为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有仆人即引予等到会客室。有长方桌一，洋式坐椅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品。……除此粗糙之仿制品外，更无可赏目之装饰。然室内不见尘埃，朴素之气令人爽悦。数分钟后，李人杰氏来。[以上为会见时芥川所作笔记]



与芥川见过面的李汉俊



修复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李氏曾在东京读过大学，故日语极流畅。就其善于使对方明白费解的道理来讲，其日语也许在我之上。……会客室内通向二层的梯子垂落于室内一角，故有人下楼，客人先见其足。李人杰氏出现时，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他脚上的中国鞋。[3]

“少年中国”一语译自“*Young China*”，是中外新闻界对当时富于改革精神的一般新派人物惯用的称谓，并不一定专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李汉俊是中共领导人之一，但是芥川并非因此才去见他，而李也不会对初次见面的芥川谈到成立共产党的事。

芥川对李汉俊居处的描写，和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完全

一样。复原的大会会议室里，摆着长方桌和洋式坐椅，也有通往二层的楼梯，同样简朴得没有任何令人悦目的饰物。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恐怕就是在这间芥川走后没有加以任何改变的风子里召开的。

对李汉俊的印象和谈话的情景，芥川这样记载道：

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李氏道，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李氏又云，要兴起社会革命，不能不依靠宣传。是故吾人要著述。……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蹙眉。〔4〕

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李汉俊，在此次会晤两个月之后，受共产国际指示，开始召集各地成员，以召开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此时他正在上海的进步报刊上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其笔锋犀利、逻辑严谨、感觉敏锐，恰如芥川对他相貌的描述一样。这一点，从初期共产主义者称他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5〕也可得到证实。正是他对芥川说，中国需要社会革命。所谓“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是指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共和国或“民国”不久即成为一副空架子，造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整个社会的革命，而不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私相授受或互相争夺；自己正是为了宣传革命而面对“万里荒芜”大声疾呼。同时表达了“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的悲壮决心。

会见快结束时，芥川问：“除宣传手段外，尚能顾念艺术否？”李汉俊的回答只是：“几近于无。”据说他也曾读过被称作



“艺术主义”或“艺术派”的芥川的小说，可芥川没有记下面对如此回答自己作何感想；不过芥川对李汉俊其人颇有好感。芥川4月30日从上海寄给泽村幸夫（《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信中特别提到他：在上海见到的名士中，“李人杰才华出众”。<sup>[6]</sup>当然，这时的芥川不会想到，这位同龄人也将和自己同一年（1927年）夭折。

## 第二节 促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

李汉俊对芥川谈到决心进行社会革命时表达的壮烈态度，是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情。中国的民众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确实表现出了空前的觉悟和力量，但是，要使其按照明确的方针（比如社会主义）发展成为社会革命，从而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许多有待克服的障碍，其中之一就是李汉俊向芥川喻之为“万里荒芜”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缺少满足中国知识分子求知欲的书籍和杂志。其次，作为社会革命基础的工人运动，尽管不断发生工潮，但其实际性质仍然属于同乡意识、同业公会的范畴。另外，中国究竟有没有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这也是筹备成立共产党的李汉俊等人思索的问题之一。

尽管如此，困难和曲折最后都被克服，在20世纪20年代伊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党在历经曲折之后，在1949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现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政党，这些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这是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以中国为主，世界上对中共成立史的研究数量非常多，以成立史为对象的专著有二十多部，至于发表文章则达两千五百多篇以上<sup>[7]</sup>，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中共成立史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具体人物的行踪和几乎所有事件的时间、地点都得到了考证。如果以研究工作的劳动效率观之，对中共成立史这一历史长河中短

暂的一幕所投入的研究量之大，是不同寻常的。

既然已经有了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为什么还要再写这部书呢？那是因为这些研究并没有弄清中共成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或者说，大量的研究反而导致这样一个倾向，即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比如，中国共产党草创时期的各种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共产党、革命局等等）到底是何种组织？何时成立？相互间关系如何？对这些问题目前还仅是根据回忆录等进行各种猜测。因为每一个事件都应经过研究考证，在描述中共成立史的时候，更必须加以细致的、有时是琐碎的甄别。本书的描述总体上倾向于考证，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见解，中共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sup>[8]</sup>这个见解，由大处观之的确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传播，另外，据信 1919 年全国已经有约二百万产业工人（其中上海有约五十万人）。可是，在追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具体过程，特别是与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成立相比较时，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单纯的疑问，即共产党在东亚成立，为什么是循着朝鲜、中国、日本这样一个顺序？日本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2 年，即中共“一大”之后一年召开的。至于高丽共产党，尽管由于存在分别成立于伊尔库茨克和上海的两个派别，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但也都成立于 1921 年 5 月，即中共“一大”之前约两个月。如果共产党的成立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共产党在东亚成立的顺序应该是日本、中国、朝鲜，但是，为什么事实却恰恰相反呢？

如果说，这种“时差”，仅仅是可以忽略的“极微误差”，共产党在这三个国家几乎是同时成立的，那么，就必须解释之所以同时成立的原因。这个原因，不用说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各国进行的推动工作。实际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存在，才是造成共产党按完全相反

的时间顺序在日本、中国、朝鲜成立的真正主要的原因。既然共产党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成立，是以共产国际为纽带而密切相关的，那么就不能够将其分开来看。换言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能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样一种狭窄的观点来考察，而必须从东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宽阔视野来把握。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探讨中共成立的必要条件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论在哪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成立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而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何时从何地传来的呢？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9]</sup>毛泽东的这段话，作为受俄国革命鼓舞而参加共产党的当事者的感性认识，应该得到尊重；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俄国革命成功而一下子就传进中国的。当时的毛泽东恐怕也知道，中共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由日本传进中国的。上述李汉俊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阅读日文社会主义文献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这些都表明，必须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整个东亚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之内来把握。进一步地讲，日本和中国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结成的链条，应该视为东亚各国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甚至应该将其置于世界规模的思想交流<sup>[10]</sup>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所叙述的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正是贯穿于中国和日本及世界之间的“思想链条”的历史。

共产党成立之前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这在中国也与日本一样，都是获得“外来知识”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在“外来知识”即西方思想中，又尤其晦涩难懂，所以，不难想像即使有

日文文献的帮助，接受起来也有很多困难。与李汉俊一样通过日文文献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钊，在1919年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曾转述一位德国人的话说：“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sup>[11]</sup>所以，在探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不但应该充分考虑到知识本身固有的难度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而且也应该考虑到，尽管存在这样的距离，所谓“共产党”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为基础。

但是，成立共产党必须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日本、中国和朝鲜在共产党成立时，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水平当然各不相同。就三个国家来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不成熟，许多青年与其说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如说为了从事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而加入共产党，这在高丽共产党里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同样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里面，许多党员在追求“世界革命”的同时，也追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sup>[12]</sup>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引发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何种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各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要素，那么，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就显得重要起来。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大会（1919年）上并没有涉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它是在欧洲的革命运动趋向低潮之后才注意到亚洲的，而重点提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则是在第二次大会（1920年7—8月）上。我们在回顾共产国际的历史时必定要提及的列宁与罗易（M. N. Roy）围绕“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就发生在这次大会上。虽然罗易关于亚洲的革命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见解并没有写进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去，但确实是共产国际认识到亚洲重要性的主要原因。其次，对于因西伯利亚干涉军的

渐次撤退和远东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衰退而逐渐重新掌握远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来说，1919年发生在朝鲜的三一运动和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都足以使其把目光投向东方。于是，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宣言》里的有名语句被重新阐发，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sup>[13]</sup>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远东的工作，从1920年前后，以派遣使者的形式开始了，与此同时，在俄国国内的中国和朝鲜的侨民也成为了工作对象。高丽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单就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或迟或早来看，决定因素并不在于有无工人运动，或者是否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于与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接触是否便利，这是不可否认的。从这点讲，我们不能忘记，与陆路相连的中国接触，显然要比与日本接触容易得多（就日本来讲，还要考虑到日本警察的严密防范）。

不言而喻，中共成立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是中共的成立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共产党，至少，当时的所谓“共产党”的成立，首先要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否作为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而定。此前虽然也有不少旨在弄清这种关系的研究，但是资料本身十分匮乏，加上这些资料中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被长期封存，所以，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多种语言的资料分散在中国以外，这些资料既互相交错，又有不少互相矛盾之处，故而要断定一个个事实殊非易事。近年来，所谓莫斯科档案大都得到解密，从前只被少数苏联学者垄断并部分引用的文件资料，现在大都可以读到。<sup>[14]</sup>而且，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大型资料集也已经出版。<sup>[15]</sup>但其中中共成立时期的文件所占分量并不多。比如，1921年1月至翌年初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曾经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作的最重要机关，但其活动的具体状况迄今是个谜团。同样，尽管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时期

派到中国的人员中有俄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以及朝鲜人等，但是，此前除了关于魏金斯基（G. Voitinsky）、斯内夫利特（H. Sneevliet，一名马林 Maring，本书采用其一般称呼“马林”）等有比较完整的研究<sup>[16]</sup>以外，其他出现在回忆录中的“密使”们，至今连其生平也不得而知。

另外，1956年至翌年，当时的苏共中央曾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sup>[17]</sup>交还给了中国共产党，该档案现保存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内，其中包括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来往文件等约两万多件，但其中中共成立时期的文件只公开了几份。现在，该档案馆不但外国学者不得涉足，连对中国学者也仍然紧闭门户。<sup>[18]</sup>在这种状况下，要弄清初期的中共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当然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本书将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力图再现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人员交往。

这里顺便还要提一下如何对待回忆录的问题。由于初期的共产党是人数极少的秘密组织，因而第一手资料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回忆录在资料中所占的比重自然很大。例如，中国出版的共产党成立时期的综合性资料集《“一大”前后》（共三册）<sup>[19]</sup>中，回忆录占到了一半以上的分量。这些回忆录中当然难免有记述错误或误解，甚至存在主观判断造成的偏颇。因此，回忆录虽然在了解当时的氛围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要通过它们来确定具体的时期或事件，却大有值得商榷之处。还有些回忆录是在其他回忆录的基础上润色而成，故此，不少情况下并不能因为其叙事详细而加以轻信。关于如何对待中共成立时期的资料，日本学者森时彦早就指出过分依据回忆录的危险性，他主张对待回忆录要先进行一番彻底清算，然后再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重新建构党史。<sup>[20]</sup>这个主张，对在有关党史的资料已经相对大量公开的现在，仍然具有说服力。本书中，有的部分当然不得不依据回忆录，但在论述时，将努力根据已公开的第一手资料对每个回忆录加以引证和纠正。

看看中共成立时期中国国内的状况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才基础正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以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试想，如果中国自己不愿意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纵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得再广泛，或者苏俄和共产国际再做工作，也不会产生共产党。因此，以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独秀为中心的激进知识分子们，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历史的主人公。最初的中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济南、长沙、日本、欧洲等地方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们结合为共产主义组织的过程各不相同。有的是作为新闻工作者在介绍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感到有成立党的必要，有的是从事学生运动的，甚至有的人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初期党员以后所走的道路也各不相同。例如，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名中国人中，到1949年还在人世的有六人，但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除了毛泽东、董必武之外的11个人中，在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中就义的三人，病逝者一人，而脱党的有七人，即超过出席“一大”人数的一半。<sup>[21]</sup>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收集党史资料，对早期参与党的工作的人千方百计地进行调查取证，结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有关创建时期的地方组织的杂志、回忆录等资料。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研究，其数量对于一个50余人的小组织来讲极不相衬。在中国，中共创建史研究主要指对这些地方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创建史的研究，和早期领导人的人物研究。

本书有关中共创建时期地方组织的记述，许多地方依据中国方面的研究。但是，必须指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观点整理出的这类组织史，其对象只覆盖了与后来的中共有继承关系的组织，因而有遗漏，“异端”或“冒牌”共产党——如果把与现在的中共有继承关系的组织称做“正统”的话——的存在，就是一个例子。在当时，尽管“共产主义”一词的内涵不是很明确，但却强烈地吸引着部分知识分子，而“共产党”的名称也还不是专指中国共产党，为此，中国各地存在许多所谓“冒牌”共

产党。这一事实却几乎不为人知。此类“冒牌”共产党之一是以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部分领导人物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但不久后因未能赢得正统地位而烟消云散。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苏俄、日本及朝鲜都有些进步分子将他们当做中国的“共产党”。“冒牌”共产党涌现的背景之一是，苏俄方面对中国的工作直到某个时期以前没有统一，形成了多头联络、山头林立的混乱局面。从这点讲，对待各地的各种共产主义组织，都应该从共产国际与东亚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观点考察。补充一点说，一部分领导人后来走向“冒牌”共产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是1919年6月结成的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也不外是五四学生运动——通常被认为是中共的创立开辟了道路——的成果之一。由此可知，为早期中共提供了许多人才的五四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创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一定就是一条直线。

至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矛盾和内心世界，则更加复杂。比如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向布尔什维克的转变，上述李汉俊等激进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悲壮、孤独的情怀等等。本书中特以施存统为例，对其思想和活动进行勾画。施存统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期中共党员之一，也是由无政府主义转为布尔什维克的青年，中共“一大”召开时，他正在日本留学（因此日本警方才留下了他的资料）。他于1921年末因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而被日本警方逮捕，是参与创建中共的党员中最早被录下口供的人。所以，寻觅他当时的事绩，不仅有助于了解加入共产党的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对考察中共成立的具体过程也大有帮助。

由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由少数知识分子于1920年开始的创建中共的进程，在1921年7月的“一大”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一大”文件记载，当时党员仅有53名。<sup>[22]</sup>在这个意义上讲，本书要研究的是一个前后时间仅两年左右、涉及人数不足百人的历史现象。当然，后来的中共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质的方面，抑或在量的方面，都与创建时的中共截然不同。尽管如此，本书仍要对其进



行研究，概略讲来有三个原因。其一，历史现象或大或小，并不影响从学术的角度探求其全貌的好奇心。其二，后来的中共从未改变过党的名称，也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在谱系上，早期的共产党到底是其惟一的源头。因此，中共的创立正是“星星之火”，尽管开始时是弱小的，但到底是拥有 6000 万党员的巨大执政党的原点。

其三是基于对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 20 世纪世界史上的现代意义重要性的认识。所谓现代意义是指，由于国际间沟通和宣传媒体的发展，类似的现象在世界各地互为因果、同时发生，而任何一个现象都不可能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其影响也都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这一点，政治上表现在包括对民众的影响大大增强，为了主义可以牺牲生命，为了主义可以杀人。意识形态时代由此拉开序幕。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方面我们可以探讨其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继承性和隔绝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国一国历史的巨大时间跨度，即通过比较后来中共面貌变化的方式来考察。我们这样做时，就要思考前苏联的中共党史学者反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即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观之，中共是否是早产儿？当然，也可以采纳部分欧美学者曾经使用过的方式，以中共成立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不相称为由，认为中共的成立是苏俄强行输出革命的结果，而将其与后来毛泽东的中共（中国化的共产党）相对比。但是，本书不准备按时间轴进行那样的比较。因为，无论是不是早产儿，都改变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事实。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这一特定的时期里，共产党在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中共的成立是这一历史现象在中国的表现。要把中共成立史从后人评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当时的环境中去，这就是本书的全部意图。

在对本书做了简略概括之后，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们可以说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也就是，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复苏并传向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天时）；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